

## 第一章 《四库全书》编纂的背景和起因

### 第一节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公元1644年，清朝统治阶级利用农民起义推翻明朝政权的机会，举兵南下，进占北京，初步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清初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清统治者注意吸收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逐步克服自身的落后因素，不断调整策略，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并先后摧毁了一盘散沙式的南明小朝廷，镇压了农民军和广大汉族民众的激烈反抗，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使刚刚建立的清朝统治政权，走上了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经营，至乾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统一，是封建“盛世”的显著标志。清兵入关之际，满族社会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不久，社会组织和政权结构，还带有明显的部落痕迹。为了确立并巩固对广大汉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清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过多次冲突和反复，最终建立了以满族贵族为主体，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初期带有军事民主会议色彩、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逐渐被削弱，中枢首脑机关内阁的

权力也受到抑制，皇帝借助南书房、军机处一类非正式的权力机构，日益把用人行政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至乾隆即位，清统治者不仅消除了来自满族贵族内部各种对立势力及离心倾向对皇权的威胁，而且有效地防止了历代封建王朝司空见惯的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等各种侵犯皇权的弊端，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专制权力更加集中。乾隆始终强调，君主应当“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大臣必须“尊君敬上”，“忠于所事”，决不能“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sup>①</sup>。为此，他采取各种严格的措施，如禁止大臣结党攀援，不许皇子参与机密，取消业已名存实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等等，以防大权旁落。乾隆在他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除晚年因年老体衰略有“倦勤”外，几乎事必躬亲，乾纲独断，“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sup>②</sup>。在清代前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维护了清政权内部的稳定，也为清统治者发展经济、加强国防、经营边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康熙、雍正在位期间，都致力于巩固边疆，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在东北地区，清朝政府坚决抗击沙俄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先后与俄国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确定了从外兴安岭到沙毕纳依岭之间的两国边界，申明了两国交往的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扩张行径。在西北边疆，康雍两朝严厉镇压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谕。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谕。

叛乱活动，多次出兵，打击并削弱了叛乱势力。乾隆继承康熙、雍正未竟之业，进一步整顿边疆，加强国防，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割据，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两次入侵，为维护统一，巩固疆土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因地制宜，随俗而治，积极开发边疆经济，保证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最终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广阔版图。

在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社会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乾隆继续推行康熙、雍正以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建造海塘，并大规模蠲免赋税，仅全国范围的普免就达五次，其余轮蠲、灾蠲更是难以计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时期，耕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增加到七亿八千万亩，人口也猛增至两亿多。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逐步恢复和兴盛起来，手工业者对国家的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减弱，各地的手工作坊大量出现，纺织、棉布、矿冶、陶瓷等行业生产的规模扩大，种类增多，生产工具也有了一定的改进。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城乡贸易额增加，货币流通量增多，全国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农村集市更是星罗棋布，形成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大大加强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总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繁荣的历史时期。清朝统治阶级经过一百余年的经营，建立了牢固的对于全国的统治政权，政治安定，经济发展。这为从事大规模的封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第二节 明末清初以来学风的递嬗和 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转变

明清时期学风演变的基本特征是：考据之学逐渐取代义理之学而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理学产生并兴盛起来，学者普遍摒弃汉唐注疏，专凭己意解经。由于理学竭力宣扬纲常名教，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青睐，很快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辨色彩，使之变得更为细密、深邃。然而，理学所崇尚的治学解经方式，又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有的甚至凭空发挥，在思想、学术界造成了许多混乱。沿及明代，心学大盛，良知之说风靡海内，学者甚或“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成为社会风气，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迅速走向衰颓。

明清两朝政权的交替，对封建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场“天崩地解”的变动。他们虽然痛心于“大明王朝”的急遽衰亡，然而却又无力回天，面对“神州荡复，宗社丘墟”的社会现实，整个学术思想界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很多学者都把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视为误国误民的重要原因；黄宗羲指

责“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sup>①</sup>。顾炎武抨击理学家“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导致“股胧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sup>②</sup>。与此同时，学术界普遍提倡读书，注重实际，经世致用成为一时风尚。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为治学的主旨<sup>③</sup>，李颙主张“道不虚谈，学贵实效”<sup>④</sup>，颜元强调“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sup>⑤</sup>，黄宗羲则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sup>⑥</sup>，顾炎武更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sup>⑦</sup>，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sup>⑧</sup>，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树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sup>⑨</sup>，致力于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不仅为转变明末空疏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学术领域和治学方法上开启了新的途径。

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

① 全祖望《鮑琦亭集·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卷一一。

② 《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卷七。

③ 《朱舜水集·问答三》，卷一一。

④ 《二曲全集》卷七。

⑤ 《存学编》卷三。

⑥ 《清史稿·儒林一》，卷四八〇。

⑦ 《亭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卷三。

⑧ 同上，《与友人论学书》。

⑨ 《鮑琦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卷一二。

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治学求实，反对空谈，另一方面又迫于清王朝的文化高压政策，逐渐放弃经世致用的宗旨，使学术与现实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潜心于古籍的考订和辨正，在学术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胡渭撰《易图明辨》，考辨出被理学家附会阐扬的“河图”、“洛书”并非《易经》原文，而是五代时期道士陈抟的伪造；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证明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经典的《古文尚书》，也是后人的伪作。他们的研究，材料丰富，考证严密，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的基础，而且为以后汉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进入全盛阶段，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学者从事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封建的学术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北京和江南的一些地区更是书院林立，人才济济。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首先打出了“汉学”的旗帜，极力主张恢复汉儒的训诂，以真正理解经书的本义，强调“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因而“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sup>①</sup>。他们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不遗余力地搜辑钩稽阐释汉代经师的训诂，使得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其后，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继之而起，进一步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sup>②</sup>，有力地矫正了吴派学者“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墨守之弊，变信古为精核，变佞汉为求是，把清代汉学推向了高峰。

当清初学术由于本身内在的矛盾运动逐渐发生变化时，另一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

钱大昕《潜研堂集·戴先生震传》，卷三九。

方面，它也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强烈影响。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除采取种种措施直接镇压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外，还逐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利用文字狱的残酷手段，严厉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康熙年间，文字狱案件已屡有发生，乾隆时期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受害者或因流露怀念故国的感情，或因触犯专制皇帝的权威，甚至由于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每次文字狱，都打击沉重，株连甚广，令人胆战心惊。学者举手触禁，动辄得咎，只得埋首书斋，以避免议论朝政，接触现实。

清王朝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利用传统儒学，来笼络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康熙两朝都大力阐扬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不仅下令编纂《朱子全书》，而且还把朱熹由孔庙两庑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一些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也得到重用，并享受特殊的恩荣和优厚的俸禄。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再次居于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炙手可热。然而，受到清初进步思想家猛烈抨击和尖锐批判的宋明理学，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尽管它还能借助政权的力量显赫一时，但在理论上却失去了任何发展的余地，那些御用理学家们再三重述的太极论、理气说等，都不过是掇拾前人牙慧，烦琐陈旧，毫无生气。相反，由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强调读书，注重证据，提倡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新的治学途径，却吸引了大批既不敢讲今论史、触及时讳，又不愿人云亦云、依草附木的学者，学术界要求挣脱理学樊篱，回复汉代经学的倾向日趋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清王朝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并促成了学术潮流的转向。继顺治年间开始组织学者注释经

书之后，康熙和雍正也都注重文治，以官修的方式，不仅对《易》、《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重加疏解，而且还荟萃群书，编成《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类书。乾隆更以“稽古右文”之君自命，大规模地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并明确肯定“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sup>①</sup>。统治者的优容政策，对学术界整理、研究古代典籍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阮元所谓“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sup>②</sup>，说明了清统治者在尊崇理学的同时也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实际情形。只是理学始终未能重新兴盛起来，而汉学却很快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需要指出的是，汉学之所以能取代理学而成为清代的“显学”，还因为当时的学者在抛弃了宋明理学之后，面前并没有新的出路。明中叶以后一度出现的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未能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传教士带来的有限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学者不得不到古老的历史中去寻找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料。这样，汉代经学被请了出来，清代学术逐渐走上了一条强调通经、重视实证的道路，封建文化也相应进入一个全面总结整理的阶段，这为《四库全书》的开馆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和广阔的文化背景。

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

② 《擘经室一集·拟国史儒林传序》，卷二。

### 第三节 历朝聚书编书的概况和明末清初 “儒藏说”的出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治”始终与“武功”一起，成为衡量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历代君主为了炫耀自己的业绩和维持已有的政权，往往刻意标榜文治，而其有效的手段和常用的方法，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

据记载，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名目的典籍。此后，周天子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记录君主言行和朝中大事。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sup>①</sup>诸子百家相继兴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典籍。

汉王朝建立以后，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统治者比较注重讲求文治，开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sup>②</sup>。惠帝“除挟书之律”<sup>③</sup>，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sup>④</sup>，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儒学在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西汉末年，成帝又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sup>⑤</sup>，并诏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系统校理秘府藏书。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两代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规模宏大的工作，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④⑤ 《汉书·艺文志总序》

③ 《隋书·经籍志总序》。

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及分类、编目等方面为后世开创了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虽处于分裂之中，但各统治者仍能留意典籍，弘扬文治。魏秘书郎郑默奉令整理秘阁藏书，编成《中经》，晋荀勖因之而作《新簿》，以甲乙丙丁四类总括群书，创立了古代典籍的四部分类法。东晋李充删繁就简，调整类目，进而厘定了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的次序。

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采纳了秘书监牛弘请开献书之路的建议，诏令“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sup>①</sup>。唐朝政府更大力购求书籍，专置修图书使检校图书，并据朝中经史子集四库藏书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史称历代典籍“莫富于隋唐”<sup>②</sup>。唐王朝还组织大批学者编纂书籍，《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也是在这时期相继问世的。

北宋历朝皇帝，无不诏令访求天下书籍。太宗时还重修崇文院，作为藏书之所。仁宗下令仿唐代《群书四部录》之例，编纂《崇文总目》，并进一步搜访书籍，规定“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sup>③</sup>。徽宗时期，又据《崇文总目》补入新访遗书，编成《秘书总目》。在努力购求图书的同时，北宋政府也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书籍，《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类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标志着类书编纂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有宋一代雕版印刷技术普及民间，十分发达。私人刻书、藏书风气甚盛，这对

① 《隋书·经籍志》。

② 《宋史·艺文志》。

③ 《文献通考·经籍考》。

后世的聚书编书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王朝，但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也比较重视藏书、刻书。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窝阔台就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在平阳建立经籍所，编集经史。世祖时，曾派专人收取宋朝官府所藏书籍，运至大都度藏。此后，又再次收集宋官私所刻书板，设立兴文署刻印书籍。元顺帝在位期间，还纂修了宋、辽、金三史。

明朝建立以后，官府藏书、编书有了新的发展。朱元璋遣将攻下北京，即“封府库图籍”<sup>①</sup>，奠定了明朝藏书的基础。成祖时，下诏访求天下书籍，“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sup>②</sup>。奠都北京后，朝廷又取南京文渊阁所藏各种图书运至北京，度置文渊阁内。英宗时编成的《文渊阁书目》，收书计四万三千二百余册。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成祖时敕令纂修的《永乐大典》，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采集古今图书达七八千种以上，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清王朝继承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聚书编书的传统，在讲求文治、控制思想方面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也收到了可观的成效。顺治四年（1647年），江南地区尚处于战火纷飞之中，清统治者便沿袭中国历代王朝为前代修史的做法，迫不及待地地下令纂修《明史》<sup>③</sup>。此后，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及康熙二十五年（1686

《明史·太祖本纪二》，卷二。

② 《明史·艺文志》。

按：由于顾初元年战事频繁，纂修工作上并未进行，仅搜集到部分史料。《明史》正式开馆纂修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告成，乾隆四年（1739）刊行。

年），都曾下诏，令各直省督抚学政购求遗书。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定，统治者又进而招罗大批学者，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借以收拾人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据统计，顺治一朝，政府下令编纂的书籍不过数种，而到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御纂”、“钦定”的诸经注疏及各种类书、工具书等，即达数十种之多。特别是历经康雍两朝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十九部，都一万卷，不仅总结了以往类书编纂的成就，而且为乾隆时期更大规模的编书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从先秦至明清，历代王朝对书籍的重视，一方面说明我国有着良好的聚书编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代典籍散失亡佚的严重程度。由于我国古代典籍大多数集中度藏于皇室官府，因此，每逢兵燹战乱，朝代更迭，无数珍本秘籍便遭到修重的损失。隋代牛弘曾列举自秦至隋八百年间书籍遭逢的五大厄运，除秦始皇焚书外，其余“四厄”均为兵燹。明代胡应麟继论隋以后至明以前书籍所遭“五厄”，也无不由于战乱，再加上管理不善以及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典籍损毁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官府藏书尚且如此，私家所藏更难幸免。社会的动乱和家族的衰落，都会给私人藏书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公私藏书均遭厄运，“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梯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籍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

未之有也”<sup>①</sup>。

古代典籍的忽聚忽散，使许多学者和藏书家痛心疾首，如何保存书籍，使之流传久远，成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明代末年，学者曹学佺首次提出“儒藏”的设想，他看到“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sup>②</sup>，因而能历经朝代更迭和兵燹战乱保存下来，不由迫切感到历代浩如烟海的儒家书籍极需解决典藏的问题，否则无法避免散亡的厄运。清乾隆初年，周永年再倡“儒藏说”，称此事为“艺林中第一要事”<sup>③</sup>，认为“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sup>④</sup>。因而提出“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sup>⑤</sup>，逐步建立“儒藏”；“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sup>⑥</sup>。他的建议，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广泛响应。罗有高说：“今吾儒门喜博者鲜持择，高谈者乐简陋，故典籍日微，而文事衰坏，人品日卑”，“如周君之说，盖不悦学者所谓不急之务也，吾则不能无动焉”<sup>⑦</sup>。刘音则进一步推而广之，认为历代书籍“藏之未久，辄至散失，岂非未尝统为一编，散而藏于天下之故耶？”“今欲其聚而不散，令上下千古之书。有所依归，则莫善于儒藏”<sup>⑧</sup>。桂馥还协助周永年买书钞

钱谦益《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卷二六。

叶德辉《书林余话·印行四部丛刊缘起及例言》，卷下。

⑤ 《儒藏说·与孔荭谷》，收入《松邻丛书》甲编。

⑥ 《儒藏说》。

⑦ 《儒藏说》跋语，附载《儒藏说》卷末。

⑧ 《广儒藏说》，附载《儒藏说》卷末。

书，同筑籍书园，招致四方文人学士，“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sup>①</sup>。

随着“儒藏说”的再次提出，读书、刻书的问题也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中国古代典籍，除难以保存、不能久传而外，不能公之于众也是极为突出的问题。皇室官府藏书虽富，一般人士却无由得窥；而私家之藏，又多秘之珍之，“绀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sup>②</sup>。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书籍的流通和使用。清代初年，适应学风由空返实，学者注重读书，讲求实际的需要，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开始倡导传钞、刊刻珍本秘籍，以促进古书的传播。曹溶、黄虞稷、周在浚等人都是亲身经历明末战乱的藏书家兼学者，深知保存典籍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使之刊刻流通。曹溶作《流通古书约》，提倡藏书家互通有无，黄虞稷、周在浚则挑选家藏珍本秘籍，共同发起征刻唐宋秘本事宜。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学者也都致力于钞书刻书，特别是丛书的刊刻，逐渐成为一时风气。

作为汇集诸书而成一书的丛书，最早始于宋代的《儒学警悟》以及《百川学海》。由于它具有保存书籍、便利流通、方便使用的独特功用，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明代以后很快发展起来。至清初，丛书的刊刻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曹溶《学海类编》、张伯行《正谊堂全书》、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张潮《昭代丛书》等一批丛书。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无论是建立“儒藏”，还是整理刊布古书，都不可能靠一个人或几个人

章学诚《章氏遗书·籍书园书目序》卷八。

曹溶《流通古书约》。

的努力完成。学术的发展，社会的需求，都迫切需要有超越个人之上的力量，来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样，到乾隆中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由官方出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纂大型丛书，全面系统整理中国历代典籍的任务，便被提了出来，最终促成了《四库全书》的开馆。

## 第二章 《四库全书》的开馆和 规模空前的征书工作

### 第一节 《永乐大典》辑校建议的提出 和《四库全书》的开馆

《四库全书》的开馆，是由《永乐大典》的辑佚所引起的。由于中国古代典籍散失严重，因此搜辑亡佚书籍的工作，也就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早在唐代，马总就曾从前人的杂钞、杂记中钞录周秦以来诸子著作的散见材料，汇为《意林》一书，首开辑佚先河。宋代著名学者郑樵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提出“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sup>①</sup>，认为某些亡佚书籍可以通过其他书籍来了解它的基本内容。王应麟则搜辑齐、鲁、韩三家诗说，纂成《诗考》一卷，“以存三家逸文”<sup>②</sup>；又“旁摭诸书”，“搜罗放失”<sup>③</sup>，钞录郑玄注释《周易》的材料，辑为《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明代后期，不仅书籍散亡的现象依然严重，而且妄改甚至伪造古书的风气盛行一时。为保存古籍和恢复古书原貌，一些学者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从事辑佚工

《通志·校讎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考》提要。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周易郑康成注》提要。

作。孙穀的《古微书》，专门搜录久已不传的汉代纬书，张薄的《汉魏百三家名集》，开始辑录诗文。祁承燾在他订立的藏书规章中，还初步总结了辑佚的方法途径，指出：“书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汉者，然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书有著于汉而亡于唐者，然唐人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sup>①</sup>。前人在辑佚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讨，为清代辑佚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清代初年，随着汉学的兴起，学术界普遍崇尚汉人经注经说。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经注经说大多散佚，搜辑钩稽便成了当务之急。惠栋首先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择取汉人诸家旧注，汇成《易汉学》八卷。其后又进而采辑《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谷梁》、《论语》诸经古注，扩充为《九经古义》十六卷。其弟子余萧客继之，广泛采撷唐以前群经训诂，辑成《古经解诂》三十卷。影响所及，辑佚遂成为汉学家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清政府敕令编纂的《全唐诗》、《全金诗》等，也注意“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sup>②</sup>，开创了官府组织辑佚活动的先例。此后，学者由经及史，继而又扩展到子、集各部，举凡汉代已经亡佚的周秦古书，魏晋以后散失的西汉经师遗说，以及历代遗文遗著乃至各种小学训诂之书，都成为辑佚的内容。而保存了丰富典籍的《永乐大典》，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澹生堂藏书约》。

<sup>②</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全唐诗》提要。